

陈云的稳步前进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陶 蕾

〔摘要〕 稳步前进思想，是陈云治国理政所秉持的重要方针。其具体内容包括：反对急躁冒进，力求经济稳定运行；强调综合平衡，按比例协调发展；立足“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陈云的稳步前进思想，既谋“前进”，又求“稳妥”，重心在于求稳。稳步前进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它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稳中求进”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关键词〕 陈云；稳步前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与市场

〔作者简介〕 陶 蕾，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陈云纪念馆馆员（北京100009；上海，201715）。

作为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在经济领域累积了丰富经验，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既要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要确保经济增长的平稳和质量，是陈云始终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在不同的时期，陈云依据国情国力，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要论断，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稳步前进思想，成为其治国理政所秉持的重要方针。稳步前进思想萌芽于革命战争时期，形成于新中国建设时期，成熟、深化于改革开放初期，贯穿于陈云领导、参与财经工作的各个阶段。稳步前进思想反映了中国在探索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道路过程中的思考和实践，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稳步前进思想首先反对急躁冒进，力求经济稳定运行

陈云非常重视经济运行的稳定，他认为“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①，进而影响民心的稳定，社会的稳定。要稳步前进，就必须克服经济工作中的急躁情绪，从实际情况出发。

1953年，一些地区和部门在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的现象。陈云看出问题后，在政务院连续召开两个月的会议，采取多种措施，压缩支出，扩源开流，增加收入，终使当年的财政收支达到了平衡。1956年，经济再次出现冒进倾向，基建投资比上年增长54.7%，远高于财政收入5.7%的增幅。

^①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面对这种现象，陈云直言“我们的建设规模究竟多大，是个根本性的问题。”^①在陈云看来，建设规模大小涉及经济稳定大局，而规模该有多大的具体判断标准就是与国力匹配，“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②，因而决不能不顾国力和人民承受的能力，在规模上贪大，在速度上贪快。陈云认为“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③。根据这一判断，陈云要求将1957年的计划指标降下来。他说“如果明年不退，以后总要退下来，不退也得退。”^④陈云提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在处理工商联组织问题时，陈云告诫大家“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慢两三个月天不会塌。”^⑤

1958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历时三年的“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1962年2月21—23日，陈云在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上，直指问题要害，大胆修正中央在1月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一些观点和决策。他提出将1963—1972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为解决困难，要减少城市人口、制止通货膨胀，压低工业和交通指标，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西楼会议”之后，中央根据陈云的意见，大幅压缩1962年计划中的重工业、基本建设指标，1962年底，国民经济实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

陈云之所以能够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因为此前他做了大量的调研。1960年9月开始，陈云马不停蹄，相继去了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地；1961年下半年，陈云又重点调研了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形势，就相关议题密集召开各部门座谈会，详细了解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由于对国民经济有客观的评估和准确的把握，使他可以提出针对性强、合理有效的调整措施。

“文化大革命”后，陈云复出时号召党内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在充分了解经济运行态势的基础上制定经济政策，不能急于求成。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东北组讨论经济工作时，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急躁冒进的倾向，陈云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⑥1982年，陈云语重心长地谈到，“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⑦。晚年的陈云非常关心国家建设的规模问题，1993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某些过热现象。对此，陈云提醒“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⑧

①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43页。

②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67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④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44页。

⑤ 《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⑥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96—1497页。

⑦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

⑧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831页。

二、稳步前进思想强调综合平衡，按比例协调发展

“综合平衡”理论是陈云在长期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①他多次强调平衡问题，认为这是实现经济稳步前进目标的重要条件。“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②“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而“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③

当然，究竟如何平衡，比例如何确定，陈云认为要灵活处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④。在经济起步阶段，更要灵活处理，有所偏废，要“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大革命、大建设，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否则，不分大小，齐头并进，国家吃不消”^⑤。而“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⑥。总体而言，陈云认为，“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⑦。

1949年7月，陈云在上海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通过“银元之战”“棉纱之战”“粮食之战”，很快稳定了全国的金融物价。1950年，在陈云具体主持下，新中国开始统一财政管理、物资调度、现金管理，迅速遏制了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成功实践，孕育了财政、信贷和物资平衡思想。^⑧1954年，陈云提出了“四大比例、三大平衡”主张，即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要按比例发展；财政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物资供需之间以及信贷要保持平衡。后来随着外贸工作的铺展，陈云又加上了外汇收支平衡，变成了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四大平衡。

在四大比例中，陈云非常重视农业问题。陈云认为，中国的国情就是农业占主导地位。“‘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⑨在陈云看来，农业问题关系到稳定的大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陈云反复强调，“对粮食生产绝不能放松”，“如果粮食库存不断下降，一旦城市用粮接不上，哪怕断三天，就会闹乱子”^⑩。对陈云来说，吃饭、穿衣是人民生活中的大事，是“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⑪，“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⑫。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大胆提出从国外进口粮食；1978年，农村一亿多人口粮不足，陈云再次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二千万吨粮食。他说“我

①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1页。

②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1页。

④ 《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242页。

⑤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8-319页。

⑥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页。

⑦ 《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页。

⑧ 李成瑞《“四大平衡”思想的强大生命力——纪念陈云同志逝世一周年》，《人民日报》1996年4月9日。

⑨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6-247页。

⑩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56页。

⑪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0页。

⑫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①同时，陈云认为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基础。陈云指出“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②1962年，面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问题，陈云认为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也同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他提出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力求大干快上，出现“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冒进思想，导致经济领域有些问题凸显，突出表现在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积累和消费三大比例的失调上。对此，陈云和李先念两人联名致信中央，认为目前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大体调整过来。陈云提出，国民经济只有“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③。

“四大平衡”当中，陈云认为财政收支平衡最重要，尽量不要有赤字，“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④。财政收支要达到平衡，首先需要发展经济，经济搞活了，税收就上去了；在安排支出项目时，则要量力而行，给财政留下适当结余。两者相较，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⑤。在物资供求平衡方面，首先确保必要的生产和消费，然后是建设。陈云将吃饭问题排在最前面，体现了他对民生的关注；另一方面，建设投资的规模要同建设所需要的物资相适应。在外汇收支方面，陈云认为，“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⑥。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对引进有利的技术，是必要的。“四大平衡”就是在国家的集中指导下，将资金与物资即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的矛盾统一起来。

三、稳步前进思想要求立足“试点”“摸着石头过河”

在陈云看来，经济发展要稳中求进，发展道路的选择更要谨慎稳妥。早在中央苏区时期，陈云曾两次赴福建汀州做工人运动和《劳动法》实施状况的调查，期间他把一家京果业店铺当作“试点”，探索如何更好地让工人与雇主签订双方都满意的劳动合同，“试点”成功之后，便在当地推广。先小范围试点，总结经验，反复比较后，再加以推广，这是陈云经济工作的总思路。

1950年4月7日，陈云在政务院有关物价问题的发言中，将这一工作思路形象地比作“摸着石头过河”。“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好。”^⑦这是这一著名论断的最早阐述。一年之后，陈云又在全国工商联工作汇报会上强调“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⑧

①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98页。

② 《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3页。

③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56-1557页。

④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⑤ 《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⑥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⑦ 《陈云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8页。

⑧ 《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摸着石头过河”首先就是求稳，少走弯路，少折腾。陈云这样总结，“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①。建设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没有历史先例和他国经验可以借鉴。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先后几次大起大落，其中改革开放之前三次，之后四次，经验教训深刻。^②陈云指出“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③总结既往，陈云认为要避免波折和失误，“中国的经济发展再也经受不起以往那种有过痛苦教训的折腾了”^④。陈云反复提醒，改革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⑤采取的方法就是要经过试点，1978年后他主张办经济特区，“‘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⑥。试点可能会放缓改革的进度，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试点，以至改得不好，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⑦。

“摸着石头过河”强调阶段性和差异性。1961年陈云在听取化工部汇报时强调指出“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进行试验，不能一下就铺开搞。搞试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要把试验和推广分开，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⑧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陈云认为各个领域的工作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工业、财贸系统的体制改革不同于农业体制改革，不能简单照搬农村改革的做法。因此，要分清轻重缓急，“哪些先搞，哪些后搞”^⑨，有意识、有步骤地推进。

“摸着石头过河”强调群众经验，坚持实践出新知。总是先有实践，再有认识和规划，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陈云一贯主张，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在群众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方法对不对，还得经过群众实践的检验。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做实地调研，群众反映和调查结果证实种双季稻不如早季稻，强推双季稻种植属于主观蛮干、瞎指挥。他郑重指出“要研究，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轻易把群众的老经验吹掉，要很好地继承、研究群众的经验。”^⑩陈云主张，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多与群众商量，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众先把试验搞起来，先从局部突破，才能“摸”出规律。在陈云看来，实践对推动改革的意义更大，“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⑪。

四、稳步前进思想要求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①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6页。

② 朱佳木《陈云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党的文献》2005年第3期。

③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84页。

④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84页。

⑤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3页。

⑥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3页。

⑦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60页。

⑧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⑨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36页。

⑩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69页。

⑪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页。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陈云长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1956年，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初步确立。在整合资源和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建设中，这一体制虽然有利于调动资源、积聚优势，但严格管控也使经济失去了部分活力。1956年7月，在七位公股代表座谈会上，陈云批评说“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①

陈云提出适当放权，除了“粮食、棉花及其他主要经济作物由国家掌握外，其他都可由农民自由经营”^②。在农产品收购上搞更多竞争，不能“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③。他进而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不能忽视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按照陈云的设想，既“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④。

基于这样的思考，陈云在党的八大上系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论断。“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⑤“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是在计划经济大背景下的鲜活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探索经济发展道路上开放包容的心态和灵活辩证的思维。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陈云对计划和市场问题有了更加成熟的看法。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地方出现了只强调市场调节而忽视国家计划、只强调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而忽视必要的国家集中和国家干预的倾向。对此，陈云强调指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该调出的物资，必须按国家计划调出。全国建设的进度，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按全国计划办事”^⑥。但另一方面，要尊重市场规律，市场经济不能被忽略。在1979年3月发表的《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经济两个部分，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他认为，“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⑦。1981年12月，陈云进一步将两者的关系提炼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⑧，这一观点随后被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及年底通过的新《宪法》所接受。

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进一步将计划区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指导性计划比指令性计划更加灵活。“指令性计划”就是政府运用直接手段

① 《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28页。

② 《陈云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④ 《陈云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⑤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⑥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⑦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⑧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0页。

来干预“市场经济”，从而“限制微观经济的发展”；而“指导性计划”就是政府运用间接手段来干预“市场经济”，从而“搞活微观经济”。也就是说，国家的“宏观调控”，不只体现在行政指令上，也要更多地依靠政府的规范引导，从而合理约束市场的盲目和无序。

五、稳步前进思想的现实意义

陈云的稳步前进思想，既谋“前进”，又求“稳妥”；既要激活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努力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要确保更有质量、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概而言之，“前进”和“稳妥”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等而视之，对陈云来说，稳步前进的重心在于求稳，“稳”字当头。反对急躁冒进是“稳”字的题中之义，而强调综合平衡、按比例协调发展，立足“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则是围绕稳定这一大局的具体方略。三者确保了一种动态的、有活力的稳定，而非固定、僵化的稳定。

尽管陈云的稳步前进思想萌芽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着眼于反对“左”倾冒进给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动荡和损害，但是围绕它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并没有过时。具体而言，稳步前进思想求真务实、依托国情、注重民生，因而它早已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探索者之一，陈云的稳定观与党在之后所提出的一系列论断是一脉相承的，这些论断如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较好掌握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等理论，可以说，陈云的稳定观为党在此后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

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它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稳中求进”与陈云的稳步前进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两者都认识到面临的巨大风险与挑战，认为这些风险与挑战具有系统性、全局性，可能导致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不稳定，都认为化解风险和挑战的首要举措在于求稳，在稳定的基础上寻求突破与发展。两者都认为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在于高速，而在于质量和效益，而寻求经济增长的主要方法就是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因而，陈云的稳步前进思想仍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赵小波)